

腐败与历史译丛

CORRUPT HISTORIES

腐败史

下册

[美] 伊曼纽尔·克雷克 ◎编

威廉·切斯特尔·乔丹

邱涛 等◎译

刘北成 李亚丽◎审校

中国方正出版社

腐败史文件

CORRUPT HISTORIES



腐败史

下册

[美] 伊曼纽尔·克雷克 ①编
威廉·切斯特·乔丹
邱涛 等①译
刘北成 李亚丽①审校

中国方正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京版登字：01-2016-717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腐败史. 3：下 / (美) 伊曼纽尔·克雷克, (美) 威廉·切斯特尔·乔丹编;
邱涛等译.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174-0352-4

I. ①腐… II. ①伊…②威…③邱… III. ①反腐倡廉-历史-世界
IV. ①D5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2797 号

Corrupt Histories

Copyright ©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ina Fangzhe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腐败史（上、中、下）

[美] 伊曼纽尔·克雷克, 威廉·切斯特尔·乔丹◎编
邱涛等◎译

选题策划：陈学军

责任编辑：陈培凤

责任印制：李 华

出版发行：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100053）

编辑部：(010) 59594627 发行部：(010) 66560936

出版部：(010) 59594525 门市部：(010) 66562755

邮购部：(010) 66560933

网 址：www.lianzheng.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25

字 数：511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7-5174-0352-4

定价：78.00 元（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下）

第九章	腐败的文化与文化的腐败 ——东印度公司与黑斯廷斯弹劾案	431
第十章	混乱的街头：孟买、伦敦和纽约的警察、 腐败与焦虑	507
第十一章	情感通货 ——论印度殖民时期的非正规资本积累	580
第十二章	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晚期的商业和腐败	642
索 引		693

第九章 腐败的文化与文化的腐败*

——东印度公司与黑斯廷斯弹劾案

维诺德·帕瓦拉拉

引 言

我弹劾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先生犯下的重罪与恶行；

我以大不列颠下议院的名义弹劾他，他愧对议会的信任；

* 我要感谢叶米·阿金赛—乔治、罗伯特·葛雷格、大卫·威特沃、加布里埃拉·埃特梅克佐格劳、维吉尼·考劳顿在1998—1999年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中心所进行的有益讨论。我要感谢戴维斯中心慷慨的奖学金，以及戴维斯研讨会的与会者，尤其感谢比尔·乔丹、伊曼纽尔·克雷克、吉安·普拉卡什的重要点评。我也受益于与弗雷德里克·惠兰的讨论，以及来自阿尔温德·拉贾格帕兰和阿努帕马·拉奥的点评。尽管不得不应付一次严重的个人损失，但是阿帕纳·瑞亚普若尔给予了耐心的倾听并提供了关键性支持。

腐 败 史

我以大不列颠下议院全体议员的名义弹劾他，他使英国的国民性蒙羞；

我以印度民众的名义弹劾他，他推翻了他们的法律、权利和自由，他毁坏了他们的房屋地产，他使他们的国度变得贫瘠荒芜。

我以人类天性的名义弹劾他，无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和境遇好坏，都遭受了他的凌辱、伤害与欺压。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1788 年)^[1]

这些话出自埃德蒙·伯克于 1788 年在英国上议院所发起的一场针对英属印度第一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非常漫长的起诉，这场诉讼直到 1795 年沃伦·黑斯廷斯被宣告无罪才告结束。上述宣言捕捉到了涉及英属印度历史上肮脏片段中的关键问题——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以及对其品格的高度狭隘的诠释构建；为 18 世纪的大不列颠王国锻造国家认同感及“国民性”所做的努力；在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早期，被征服地区学习应对外族统治的各种复杂途径，包括实质上的和象征性的抵抗。这次审判和促成这次审判的事件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上体现了深嵌于殖民冲突里的文化冲突。

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在国与国之间的后殖民关系中争论和争执的焦点。例如，西方关于印度的腐败问题的论述认为，本土

[1] 在弹劾开幕式上的演说 (1788 年 2 月 19 日)，载《埃德蒙·伯克的著作与演说》第 9 卷 (牛津，1989—2000 年)，第 459 页。

的价值观和传统做法（例如，赠送礼物）与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规范不相容，从而导致了该地的腐败。^{〔2〕} 依这种观点把印度想象成一片梦幻之地，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受到古代传统结构与不变的、原生习俗的控制，又缺少西方政治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理性和明智。这种解释框架至少是非历史的，并往往忘却了殖民冲突。在殖民主义时期，关于东方的普遍性知识是由帝国的官僚和印度学专家们构建与传播的。^{〔3〕} 一方面是殖民前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另一方面是由殖民政权所引入的新价值观体系与政治文化。二者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和残酷的碰撞，反过来，这种碰撞又用意义深远的方式改造着二者。

这一章是关于 18 世纪设在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官员们所卷入的腐败问题，以及围绕着沃伦·黑斯廷斯的诉讼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化话语问题。在分析关于腐败和文化的殖民话语的时候，我避免过于拘泥于殖民主义的文本。相反，我尝试将话语牢牢置于历史语境中，并因此设法证明殖民主义具有“特定的，视情况而定的，多种多样的，迂回的，不完整的，以及常常相互矛盾的特征”。^{〔4〕} 通过考

〔2〕 当时的印度精英就文化争论的一个评论以及就这种观点内在转化的一个简单讨论，见维诺德·帕瓦拉拉《解释腐败：印度精英的视角》（新德里，1996 年）。

〔3〕 罗纳德·因登（Ronald B. Inden）：《想象印度》（牛津，1990 年）。

〔4〕 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从小国王到地主：殖民地的话语与殖民地的统治》，载德克斯编《殖民主义与文化》（安阿伯，密歇根，1992 年），第 175 页。

察孟加拉殖民地行政管理的实践，尤其是沃伦·黑斯廷斯所做的那些，连同18世纪英格兰的政治文化，我设法揭示殖民计划的分裂特质，这一特质里充满着关于国内政治和帝国责任的矛盾与内部争论。〔5〕

“东印度的财富”：从贸易到主权

18世纪是一个典型的充斥着禄虫〔6〕和腐败的时期，而当自身情况特殊的东印度公司加入其中时，印度在这段时期内滋生腐败似乎不仅不难理解，而且几乎不可避免。

——珀西瓦尔·斯皮尔（Percival Spear）（1932年）〔7〕

众所周知，英帝国对印度感兴趣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英国就已开始的早期商业冒险活动。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或“可敬的东印度英商贸易联合公司”〔8〕早在17世纪初便获得一系列特许状，开始在印度开展贸易活动。这些特许状使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英国对好望角以东的亚洲地区的贸易。1615年，英

〔5〕关于在殖民地企业里的断裂，见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殖民主义的文化：人类学，旅行，政府》（普林斯顿，新泽西，1994年）。

〔6〕禄虫：利用职权谋求私利或报答使其获得任命的官员。——译者注

〔7〕珀西瓦尔·斯皮尔：《纳波布：在18世纪印度的英国人社会生活的研究》（1932年；再版，德里，1998年），第29页。

〔8〕在这篇文章的余下部分，它将以“东印度公司”而被提及，或者简单地称为“公司”。

王詹姆斯一世的大使托马斯·罗伊爵士 (Sir Thomas Roe) 收到了一封来自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汉吉尔 (Jahangir) 的敕令^[9], 授予英国人在西部港口城市苏拉特 (Surat) 的居住权 (以及在帝国自由迁徙的权利), 以及只需要支付微乎其微的关税就可以继续开展贸易的权利。^[10]

很快, 英国人就成功地在孟加拉建立起了贸易前哨基地, 包括 17 世纪末在加尔各答所建立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居住地。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 (Aurangzeb) 在 1707 年去世后, 首都德里政局动荡, 地方当局伺机而动, 经常干涉英国人的贸易活动。然而, 东印度公司在 1717 年遣往莫卧儿帝国皇帝法鲁克锡亚 (Farrukhsiyar) 宫廷的代表团帮助英国商人获得一个内容广泛的敕令, 不仅加强了东印度公司不用缴纳关税, 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 而且授予其“治外法权”, 这是所有其他商人所没有的特权。^[11]

莫卧儿帝国的声望和权力日渐式微, 一方面是由于西印度的统治者马拉塔人对莫卧儿帝国的权势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省的省督 (纳瓦布) 开始摆脱中央的控制, 并试图在孟加拉、阿瓦德 (奥德) 和卡尔纳提克建立他们自

[9] 一个帝国的敕令或者公告。虽然我已经对所有的印度单词和名称使用了现代拼写, 除了那些有熟悉英文版本的地名, 但是在引文中仍保留了原始拼写。

[10] 苏库马尔·巴塔查里亚 (Sukumar Bhattacharya): 《东印度公司与孟加拉的经济, 从 1704 年到 1740 年》(加尔各答, 1969 年)。

[11] 苏提帕塔·森 (Sudipta Sen): 《自由贸易帝国: 东印度公司与殖民地市场的建立》(费拉德尔菲亚, 1998 年)。

己的王朝。^[12] 在 1727 年到 1750 年之间，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多次收买纳瓦布，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到了 1756 年，形势紧张到了极点，当时孟加拉新任纳瓦布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ud-daula）显然对英国人滥用贸易优惠政策感到恼怒，袭击了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的据点，并暂时成功地驱逐了英国人。但是驻扎在南部马德拉斯的英国军队在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上校的指挥下，向孟加拉进军，并重新控制了加尔各答。在试图与西拉杰·乌德·达乌拉就贸易条款重新谈判的努力流产后，克莱武认识到要想保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长期利益，唯一途径就是替换掉不听话的纳瓦布。

1757 年，在西拉杰·乌德·达乌拉手下具有反叛之心的朝臣的里应外合下，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中一举击垮了纳瓦布的军队，用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的话来说，这场斗争预示着“对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征服”。^[13] 克莱武将米尔·贾法尔（Mir Jafar）扶上了孟加拉王位，作为对其与英军通力合作的奖励，这个举动彻底削弱了纳瓦布的威信，也开启了英国人干预印度内政的时期。这还只是一系列王位争夺战的序幕，其结果是纳瓦布的权力被迅速削弱，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12] 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B. Barnett）：《帝国纵横间的北印度：阿瓦德、莫卧儿和英国，1720—1801》（伯克利，加利福尼亚，1980 年）。

[13] 拉纳吉特·古哈：“一个征服预言”载《社会文本》54，16：1（1998 年春）：89。

英国人充分利用动荡的政局，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14]

在印度大发横财的东印度公司官员口中所谓的“印度财富”，便深深地植根于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的世仇。这些世仇中敌对的双方都乐意向英国人支付巨款作为“礼物”，以寻求英方的支持；如果他们表现出一丝不情愿，英国军官就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米尔·贾法尔登上纳瓦布之位后，慷慨地向克莱武和东印度公司的其他职员赠送了大量的礼物。东印度公司理事会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总共收到 170 万卢比，至于不属于特别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则每人分到了 10 万卢比，而克莱武本人获赠的金额不少于 160 万卢比。^[15] 其他几个官员则根据他们的职位等级获得了数量不一的金额。据一个议会委员会估计，在短暂的后普拉西时期，英国人收到的好处费总计约 124 万英镑。^[16] 除了这些慷慨赠予的大量财富之外，克莱武还获赠了

[14] 克莱夫和他的东印度公司同伙官员被威廉·波尔茨有名的嘲笑为“纳波布的制造者”，见威廉·波尔茨《印度事务的思考：尤其关于孟加拉附属地的现状》（伦敦，1772年），第 vi 页。

[15] 马歇尔（P. J. Marshall）：《东印度的命运：18 世纪的英国》（牛津，1976 年）。马歇尔提供了一个卢比对英镑的换算比率，在 1770 年前是 1 卢比大约等于 2 先令 3 便士，之后则是约等于 2 先令。根据马歇尔的估算，1 拉克或者 100000 卢比大约等同于 11000 英镑。

[16] 《下议院的委员会报告》（iii）（1803—1806 年），第 311 页。

一块每年能带来 27000 英镑收入的终身封地^[17]，为了这块封地，他不得不在英国和印度两地再三地地为这块封地开脱。^[18]多年以后，克莱武就“光彩的”与“不光彩的”礼物之间的区别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坚称他在采取支持米尔·贾法尔的行动之前，并没有事先为了获得上述好处而与其有任何约定：“我坚信，在正大光明的情况下，收受礼物并非不合适；但如果赠送礼物的目的不甚光彩，那么，先生，我认为收受礼物尤其不合适。早年，兢兢业业地工作并没有为我带来报酬或荣誉，所以我希望议会能够认同这一点，考虑到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理应在后半生得到回报。”^[19]

1763 年和 1765 年（米尔·贾法尔于当年去世），相似的情形再度上演，它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提供了更多大发横财

[17] 在孟加拉统治下一个享受保有权的公共用地，其指定地带的收入被交给了国家的一名忠实的仆人。见拉纳吉特·古哈《孟加拉资产的管理：一篇关于永久移民看法的论文》（1963 年；再版，达勒姆，北卡罗来纳，1996 年），第 33 页。

[18] 有证据表明克莱武实际上是向杰出的印度银行家贾加特·塞斯（Jagat Seths）索求一块“等同于自己级别”的封地。见克莱武对塞斯（1759 年 1 月 31 日），《委员会报告》（iii），第 224 页。

[19] “克莱武爵士在下议院前的辩护，1773 年 5 月 19 日”，见《东印度公司，1600—1858》第 2 卷，载马歇尔编《帝国的难题：英国与印度，1757—1813》（伦敦，1998 年），第 171 页。这个演说后的两天，下议院投票驳回对克莱武的腐败指控，并且因他已经提供给英国“伟大而有功劳的服务”而称赞他。

的机会。^[20] 1765年，米尔·贾法尔十来岁的儿子纳杰姆·乌德·达乌拉（Najm-ud-daula）被宣告成为合法继承人。这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据知为了获得莱布苏巴哈^[21]（Naib Subah，或首席大臣）这类更低一级的官职，竞争者甚至也会大肆派发礼物，以求成功获得任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莱武在1765年被派回印度，负责清除政府部门的不法分子，他对东印度公司大小官员收受礼物的行为展开了一系列的正式调查，甚至以曝光腐败行为相威胁，致使一名理事会成员被迫辞职。

1765年，克莱武与莫卧儿帝国皇帝成功缔结《阿拉哈巴德条约》，所以这一年也标志着拉纳吉特·古哈所称的“历史尖锐的断层”。^[22] 该条约为东印度公司争取到了孟加拉的蒂旺尼（diwani）一职，也就是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征收税款的权利，并肩负起审理民事案件的职责。自普拉西战役后，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扮演的政治角色不仅变得正式，而且上升到多个层面。当时的许多评论家将1765年后滥用权力的情形愈演

[20] 马歇尔：《东印度的命运》，第168—172页。在1765年1月，孟加拉议会收到了来自伦敦公司董事们的指示，那就是雇员们必须签署反对收受礼物的协议。但是在米尔·贾法尔去世后，由于发薪水日子的逼近议会对此份指示不予理会。

[21] 印度的“苏巴”即为省，主管省的最高长官称“苏巴哈达尔”或者“纳瓦布”。——译者注

[22] 古哈：《孟加拉资产的管理》，第24页。古哈给像亚历山大·道的作者们建议把“过去杰出显赫与现在落魄潦倒”分开。参见亚历山大·道《印度斯坦的历史：从阿克巴逝世到奥朗则布的全面解决》（伦敦，1772年）。

愈烈归因于东印度公司的这种双重角色，它既是“商人兼统治者”，又是“统治者兼商人”。^[23] 在担任蒂旺尼之后，英国人实质上已经掌控了孟加拉，尽管一连串的纳瓦布们继续存活了一阵儿，他们名义上是苏巴达尔（subahdars）^[24]，但实际上却仰仗着东印度公司的赏赐度日。到了18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帝国”，就像加拉赫（Gallagher）和鲁宾逊（Robinson）所指出的，在这个帝国里，商业势力控制了一个地区的政治，以保护他们的贸易利益。^[25] 到18世纪60年代末，正如克莱武直言不讳地指出的那样：“伟大的莫卧儿名义上 [是]^[26] 莫卧儿，实际上无足轻重…… [而] 纳波布^[27]（Nabob）名义上 [是] 纳波布，实际上是东印度公司最恭顺低下的仆人”。^[28] 因此，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莫卧儿中央政府，随着孟加拉统治者的权威日渐下降，英国人实际上掌控了孟加拉的统治权。此外，由于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法国在印度对英国造成的威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烟消云散了。深受此胜利的鼓舞，英国人也开始了领土

[23] 波尔茨：《印度事务的思考》，第vii页；也见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载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编《探究国家财富的本质与原因》（纽约，1937年），第600—603页。

[24] 最初，是在孟加拉统治之下的一个省长。

[25] 加拉赫盖尔（J. A. Gallagher）和鲁宾逊（R. E. Robinson）：“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经济史评论》第6期（1953年），第1—15页。

[26] 此处“[]”及原文其他各处均为作者所加。——译者注

[27] 在印度对有身份的穆斯林的尊称。——译者注

[28] 引自鲍恩（H. V. Bowen）《税收与改革：在英国政治里的印度难题》（剑桥，1991年），第10页。

扩张。^[29]

1770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导致了人口大量死亡，其惨状令人震惊，也加剧了英国国内对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横行霸道所产生的不安情绪。^[30]这场饥荒给大众的想象力带来巨大的冲击，确实加速了英国议会改革的决心；与此同时，其他的重要因素也促使公众舆论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暴政的不满达到高潮。1772年，英国议会期待东印度公司在担任蒂旺尼之后会带来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当东印度公司差点宣布资不抵债并向政府申请贷款的时候，大家都震惊不已。^[31]在这一年也可以看到，商人和旅行家等人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对东印度公司进行“越来越频繁的文学攻击”^[32]，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道（Alexander Dow）、威廉·波尔茨（William Bolts）、亨利·帕

[29] 苏迪帕塔·达斯（Sudipta Das）：“在印度英国对法国羁绊的反应，1763—1783”，载《欧洲历史季刊》第22期（1992年），第39—65页。

[30] 关于在孟加拉饥荒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见纳伦德拉·克里希纳·辛哈（Narendra Krishna Sinha）《孟加拉的经济史》第3卷，第3版（加尔各答，1965—1970年）。

[31] 露西·萨瑟兰：《18世纪政治中的东印度公司》（1952年；再版，韦斯特波特，康涅狄格，1979年）。关于担任旺尼后的十年间，“印度难题”在英国本土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见鲍恩《税收与改革》。

[32] 古哈：《孟加拉资产的管理》，第10页。

塔洛 (Henry Pattullo)^[33]。由归国的东印度公司职员组成的团体越来越活跃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再加上议会中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力量重新集结,从而使得改革势在必行。

1772年,一个议会特别委员会对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展开全面调查。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资深成员,沃伦·黑斯廷斯被从马德拉斯调到孟加拉担任总督。同年年底,由首相诺斯勋爵 (Lord North) 牵头的秘密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最终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1773年调控法令》。该法令确立了议会对印度事务的有限控制权,而由黑斯廷斯就任孟加拉大总督一职,其权力将受到由政府任命的地方议会的制衡。此外,还在孟加拉成立了一个最高法院。该法令禁止在印度开辟新的领地以及发动侵犯战争。这是为了遏制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家所说的“边际扩张”行为,即当地的殖民执政官自作主张,发动此类侵略行动,而帝国大都会的领导层却鞭长莫及。^[34] 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控制权拉锯战似的你争我夺,此情此景从这项法令获得通过可见一斑。英国的核心政治精英们坚持认为,不仅东印度公

[33] 由亚历山大·道提出,也可见《印度斯坦的历史从最早的年代叙述到阿克巴的逝世,转变为德里的穆罕默德·卡西姆·菲瑞斯塔的波斯人和一篇关于婆罗门的宗教与哲学专题论文一起,带有一个孟加拉帝国历史的附录,从在穆罕默德·萧统治时期它的衰落到现在这个时期》第2卷(伦敦,1768年);波尔茨:《印度事务的思考》;亨利·帕塔洛:《一篇关于土地耕作和孟加拉税收改进的论文》(伦敦,1772年)。

[34] 见沃尔夫冈·莫姆森 (Wolfgang J. Mommsen) 《帝国主义的理论》(芝加哥,1982年),法拉 (P. S. Falla) 译,第77—95页。

司应该对股东和一般民众负责，而且政府有权也有责任干预其对印度的管治。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还规定收受印度人的礼物是非法行为。

然而，东印度公司官员并不是因为普拉西战役后的形势发展给他们提供了积累财富的新机会，而突然变得腐败起来。在1757年之前，人们对利用职位特权牟取私利的行为早就已经态度鲜明。东印度公司的官员队伍人数在1757年到1773年之间增长了将近三倍，达到约250人，同一时期他们的薪水和补贴也上涨了两倍。^[35] 当孟加拉的行政管理需求过大，不得不增添人手的时候，没人能够摒弃庇护关系，拒绝为英国权贵的家人及朋友分配工作。孟加拉的各位总督源源不断地收到祖国的政客们写来的推荐信，因为对东印度公司在英国不受欢迎的事实心知肚明，必须谨慎对待，所以他们简直无法冒着风险对此类请求置之不理。

孟加拉的诱惑不完全局限于工资和津贴——尽管这两样已经相当可观，但工资和津贴本身并不是特别有利可图。^[36] 对英国的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备受歧视的苏格兰人而言，在东印度公司谋得一份差事便意味着可以获得大量的“礼物、赎金和战利品等好处”。^[37] 有文字记载的贪

[35] 马歇尔：《东印度的命运》，第180页。

[36] 在1776年一名公司职员的平均收入仍然只有每年685英镑。马歇尔：《东印度的命运》，第182页。

[37] 琳达·科利：《英国人：锻造这个国家，1707—1837》（纽黑文，康涅狄格，1992年），第129页。